

基於經濟學“小”方法論的澳門學研究

——對澳門城市功能、產業發展和空間格局演變的分析

郭萬達

【提要】 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需要構建適合澳門特點的學術範式和方法論。經濟學的“小”方法論，有利於豐富澳門學研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提出“小的是美好的”主張，“小”方法論在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心理學等各個領域都有討論和涉及。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小”方法論廣泛應用於產業經濟學、城市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是比較典型的“小”城市，用經濟學“小”方法論來分析澳門城市功能、產業發展和空間格局的演變，具有客觀性和獨特性。澳門小而美，小而特，小而精，小而優，城市功能是“小中見大”，產業發展是“以小博大”，空間格局是“由小延大”，澳門應更注重質量，而不是規模。從“小”方法論出發，以發展的視角來剖析澳門城市經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統籌澳門的時間、空間和結構，有利於豐富“澳門學”研究。

【關鍵詞】 澳門 澳門學 方法論 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 F83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2 - 0037 - 08

一、以經濟學“小”方法論豐富“澳門學”研究

自三十多年前有人提出建立“澳門學”(Macaology)的學術倡議，吸引了不同領域的學者參與，政治、經濟、歷史、人文、地理等各領域的學者都有集聚，在不同的領域豐富和發展了“澳門學”。但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學”作為一門“地區學”，其研究對象是澳門這個特定區域所發生的“故事”，因此研究的視角就不僅是澳門的過去和歷史，也要包括澳門的現在和未來，要從時間、空間和結構三個維度全方位地開展研究。也就是說，“澳門學”不僅要解釋歷史，而且要面向實踐，更要為澳門的未來指路。

近十幾年來，“澳門學”的研究有了一個較大飛躍，很多學者已經從學術範式和方法論的視角對“澳門學”作了更深入的討論，為“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打下了基礎。^①方法論就是用什麼樣的觀點、什麼樣的思維、什麼樣的工具來觀察、分析這個世界。當然，不同的學科會

有不同的方法論，作為跨學科的“澳門學”，有沒有一個適合澳門特點的通用的“方法論”呢？這是我思考的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還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時，讀了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E. F. Schumacher）《小的是美好的》一書，當時讓我很震撼，因為在我們所受的主流經濟學教育中，都是用“大”方法論來分析經濟現象，崇拜大規模、大生產、大機器、大企業、大產業、大城市，舒馬赫卻用“小”方法論來分析，提出小規模、小技術（中間技術）、小經濟，認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經濟更加人性化。舒馬赫“小”方法論思想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現在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認可和推崇。

2017年12月11日，當我在美國芝加哥訪問穿梭在摩天大樓之際，到處感受到大工業時代“大”的價值觀無處不在，“Big, Big, Big”，直到今天，芝加哥的寫字樓的電梯上仍能看到這樣的廣告。但是城市迅速膨脹，發展路徑趨於標準化和同質化，扼殺了城市的個性和多元性，且引發環境污染、城市病等問題。今天來看舒馬赫的“小”方法論，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實際上，“大”與“小”是一個相對的、辯證的概念，既包括狹義的大小，如物質世界的大與小，國家的大與小、城市的大與小、生產規模的大與小等，也包括廣義的大小，如歷史的長與短，空間距離遠與近，人口的多與少等。“大”與“小”是一對相互矛盾、相互制約的關係，但“大”和“小”又互相依存、互相轉化，可謂“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生物界是“多態均衡”的，“大”與“小”相互博弈，沒有優劣之分。在經濟學、歷史學、空間地理學、城市發展學、社會心理學等各個領域，“大”與“小”的方法論普遍存在，很多學者也進行了不同的研究、有各自的表述，如表1所示。

表1 各領域中關於“大”與“小”方法論的表述

	“大”方法論	“小”方法論
經濟學	規模收益遞增 正外部性 大推進論	規模收益遞減 溢出效應 持久性經濟學
歷史學	宏觀歷史觀 大歷史觀	微觀歷史觀 小歷史觀
空間地理學	區位理論的“向心力” 空間鄰近效應	區位理論的“離心力” 空間擁擠效應
城市發展學	聚集經濟效應 城市發展乘數效應 城市發展循環累積效應	增長極的極化效應 “飛地”經濟 逆城市化效應
社會心理學	馬太效應 蝴蝶效應 滾雪球效應	二八定律 反木桶原理 登門坎效應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有關資料整理。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小”方法論廣泛應用於產業經濟學、城市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中。

從產業經濟學的應用來看，產業組織理論對企業規模的變化是有爭論的，因為企業規模擴大時既可能出現規模收益遞增，也可能出現規模收益遞減。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論”認為，

足夠規模的資本才能形成經濟發展的氛圍，若企業規模過小，缺乏規模效益，“外部經濟”效應微小，投資的社會獲利能力則低。^②與之對應的“規模效應遞減”理論則提倡“小”規模，該理論認為生產效率很可能隨著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而下降，信息流通不暢，管理困難，企業負擔過重，人際關係複雜等因素皆會影響生產效率。此外，持久性經濟學認為小團體規模的生產者比大規模的生產者更愛惜自然資源，因此提倡“小規模”。英國人保羅·狄金森在《淡化規模——小企業如何打造大品牌》中指出，“大企業是一種災難——這種災難正在全球範圍蔓延”，他指出大企業的優勢將有可能被小企業的一種“特殊的優勢”取代，那就是全方位個性化的服務。

從城市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的應用來看，區位理論認為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地理上分佈是不平衡的，既可能由於“向心力”產生“大規模”的集聚，也可能由於“離心力”產生小規模的分散。城市發展的乘數理論和城市發展的循環累積效應都闡述了城市大規模擴展對城市總體經濟的拉動作用，但是作為區域發展增長極的城市，會吸引該地區的資金、技術和勞動力向“極”流動，而並不將自身的商品、技術和資金向周邊地區釋放，導致“飛地”經濟出現，只有極化而無擴散效應，從這個角度來說，“小”規模的“極”點城市也是美好的。此外，空間經濟的“擁擠效應”認為城市存在最優規模，當城市超過了最優規模時，集聚效應會向擁擠效應轉變。^③土地肥力遞減規律指出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超過一定限度以後，增加的收益就會依次遞減，因此提倡往“小”方向發展。空間經濟學家還認為，一國經濟是由各種“經濟空間”構成的，這種“經濟空間”不是“幾何空間”或者“地理空間”，而是一種“勢力範圍”，某些經濟單位具有向心力與離心力形成各種經濟中心，每一個中心都能發揮吸引力與擴散力，並形成特定的作用範圍，從而構成其特定的經濟空間。^④

在信息化和互聯網時代，產業的形態、規模的形態都發生了改變，使“小”方法論更具有應用價值。發生在IT產品的微小變化或者變革，將對產品本身的效應、對行業的影響產生顛覆性的作用。比如摩爾定律主導下的信息技術產業雖小而精，卻能起社會經濟形態的巨大轉型產生影響；基因雖小，卻能通過DNA的複製、表達、修復等技術，起到“顛覆作用”。互聯網改變了“中心”和“規模”的定義，服務提供者關注的是去中心化後的“終端”、“個體”，而行業變革的聚焦點往往也“集中”在這些分散的億萬個“個體”身上。互聯網接入端口從單一走向多元，網絡結構的中心開始淡化中心化、集權化，^⑤關注點聚焦在每個“接受服務的個體”，引領行業變革的平台（APP）和產品（快車、專車、順風車、公交車、自駕租車、代駕等）由此產生。

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應用也改變了空間的形態，有形的地理空間是“小”的，但無形的虛擬空間是“大”的。諸多發展理論認為，城市經濟體的發展往往受到有形地理空間的限制，尤其是一些遠離陸地板塊的城市或地區，因為必須依賴土地、人口等生產要素。但是，隨著科技、信息、資金等要素對發展模式的重塑，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認為，城市完全可能突破土地、人口等對有形空間要求較多的要素的限制，實現在有限有形空間基礎上的、對“無形空間”（或虛擬空間）的拓展。

“小”方法論是針對“大”方法論而言的，如果說“大”方法論是用“規模”來觀察世界，那麼“小”方法論就是用“質量”來觀察世界。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是比較典型的“小”城市，但無論是從歷史、現實還是未來的角度來講，澳門都是“小的是美好的”典型案例。澳門小而美，小而特，小而精，小而優，城市功能是“小中見大”，產業發展是“以小博大”，空間格局是“由小延大”。用經濟學“小”方法論來分析澳門城市功能、產業發展和空間格局的演變，具有客觀

性和獨特性。以此為案例，不僅豐富了經濟學的理论和澳門學研究，也對澳門現實和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二、小中見大：澳門城市功能的基因特質

澳門的城市功能是“小中見大”，其基因特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澳門地域雖然狹小，但城市規劃的功能較“大”，綜合且均衡，生活居住或工作旅遊在澳門，會覺得很方便，城市很人性化。從城市規劃的理论演進來看，上世紀20年代掀起了現代城市規劃運動，1933年《雅典憲章》發表，城市規劃步入現代主義的“功能分區”時代，這是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典型特徵，使城市變得單調、隔離。之後，新都市主義強調回歸傳統鄰里關係和尊重特色文化，使城市更適宜人們居住。澳門城市功能定位的“五宜”，即“宜居，宜業，宜遊，宜行，宜樂”，說明澳門是一個城市多功能的綜合體，是“小中見大”，符合新都市主義規劃理念。特區政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提出了未來澳門城市發展追求“均衡性”、“協調性”，追求更多元、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也是“小中見大”的城市規劃理念的體現。

2. 澳門的“小中見大”，這個“大”，不是粗放發展的“大”，不是攤大餅的“大”，也不是不可持續沒有競爭力的“大”。澳門的“小中見大”，主要表現為空間小，密度大，效率高，競爭力強。1) 澳門人口密度大。2016年，澳門陸地面積僅有30.5平方公里，管理海域面積85平方公里。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澳門2016年人口為64.49萬，平均人口密度為2.11萬人/km²，澳門人口密度是深圳的（0.99萬人/km²）2倍，是香港的（0.68萬人/km²）3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2) 澳門經濟密度大，經濟效率高。自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經濟迅猛發展，本地生產總值（GDP）從59.17億美元，發展到2016年的448.03億美元，增長了7倍多。內地城市中經濟密度最高的是深圳，但與澳門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2016年，澳門人均GDP達到6.95萬美元，是深圳（2.55萬美元）的3倍，澳門每平方公里承載的GDP是14.59億美元，是深圳（2.54萬美元）的6倍，具體如表2所示。3) 澳門的機動車密度和旅遊密度高。澳門堪稱世界上機動車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截至2017年10月，擁有各類機動車24萬輛。⑥澳門旅遊密度較高，2016年，旅遊接待遊客3,150萬人次，居民與外來遊客之比高達1:50，2017年10月入境旅客共288.87萬人次，平均每天需要接待9.63萬人次。4) 澳門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強。根據《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6）》，在中國294個城市中，澳門的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第9，可持續城市競爭力排名第5。⑦

表2 澳門和深圳的經濟密度對比（2016年）

	面積 (km ²)	人口 (萬人)	人口密度 (萬人/km ²)	GDP (億美元)	人均GDP (萬美元)	(億美元)/km ²
澳門	30.5	64.49	2.11	448.03	6.95	14.59
深圳	1196.85	1190.84	0.99	3034.11	2.55	2.54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年鑒2016》，《2016年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澳門2016年GDP數據來自於萬德數據庫，深圳2016年以美元計算的GDP是根據人民幣匯率換算而來。

3. 澳門的“小中見大”，還表現在其歷史文化是“小而多元”，城市建築是“小而豐富”。“澳

門是個小地方，但澳門歷史卻是一篇大文章；澳門的資料並不豐富，但澳門歷史文化的內涵卻是一座永遠也無法開採罄盡的寶山”。^⑧從縱向的歷史發展來看，澳門由最初的海港小鎮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海港都市，對於一個“小地方”來說，已經積澱了具有可探索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從中西交融的文化史來看，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是一個“華洋雜居”之地。澳門擁有混合型的人口結構、中西融合的語言文化、服飾飲食、教育制度以及節事活動等。澳門通過“東學西傳”和“西學東漸”，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一個橋樑，由此澳門文化被稱為“雜交文化”、“中西合璧文化”。^⑨澳門的城市建築是凝固的歷史文化，反映了這種多元的豐富的文化特質。澳門歷史文化城區的小型建築群，以“老”且“小”居多，是中西方在建築風格、美學觀念和工藝技術等方面文化交流、多元共存的結晶。^⑩澳門街道由彩色的小碎石鋪就，是澳門極富特色的“小而美”的理念體現，不僅節儉，而且方便行走。

三、以小博大：澳門產業發展的基本理念

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以小博大”是其產業發展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現在澳門以獨特的博彩、旅遊、特色金融等產業作為其經濟優勢，以“小資源”帶動“大市場”，以“小產業”獲取“大回報”。

1. 澳門“以小博大”的第一層含義，這個“博”指的是博彩的“博”，博彩及中介服務是澳門的重要支柱產業。博彩業是澳門特殊社會環境的產物。本世紀初，澳門博彩業日益現代化及國際化，帶動了旅遊等相關產業發展。1) 博彩業對澳門經濟有特殊的貢獻，博彩業（包括博彩中介業）在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較其他行業高。2013年，博彩業增加值佔澳門GDP的比例高達63.1%；由於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影響，2014年和2015年博彩業增加值佔澳門GDP的比重下降至58.5%和48.0%；2016年博彩業開始回穩，這一比重僅輕微下降0.8個百分點，為47.2%。^⑪即便如此，這一比例仍然不低，是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2) 博彩業為澳門提供超過8萬個就業職位。澳門就業居民總數約為30萬，從事博彩業的居民接近1/3。2017年第3季度數據顯示，澳門30%的人從事“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為8.43萬人；其中27%的人從事“博彩及博彩中介業”，^⑫為7.57萬人。3) 博彩業承擔了一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義務，還帶動澳門社會和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比如改善澳門交通、投資市政建設、捐助各種基金、贊助文化事業等義務；近年來，還參與了投資建設澳氹大橋、澳門國際機場、新澳港客運碼頭、氹仔新區開發等多項大型工程。

2. 澳門“以小博大”的第二層含義，這個“博”指的是“一中心、一平台”。澳門借助其優越的地理位置、開放的自由港、廣泛的國際聯繫、低廉的旅遊費用，通過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休閒旅遊業和其他特色產業，實現產業的適度多元化。2016年，澳門的觀光景點為213處，其中澳門世界遺產、展覽廳和教堂的數量位居前三，分別有25、19和18處。^⑬近年來，旅客入澳數量持續超過3,000萬，遊客以青年為主，他們傾向於“自助遊”與“自由行”，視小澳門為短遊勝地。中葡文化旅遊是澳門的一大特色。澳門在“一中心、一平台”建設的大框架下，探索開發服務葡語國家的旅遊產品和開展中葡經貿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產業的多元化尋找機會和路徑。

3. 澳門“以小博大”的第三層含義，這個“博”指的是金融業，“特色金融”是澳門着重拓展的一個產業方向。相對於香港而言，澳門金融業結構單一，業務高度集中，以傳統業務如銀行、保險為主。澳門銀行體系規模也較小，自身金融服務需求不足，但澳門發展金融卻因自身優

勢和特點而獨具特色。1) 澳門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沒有外匯管制，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稅制簡單且稅率低，具有與國際接軌的金融監管制度。2) 澳門金融業國際化程度比較高，澳門銀行體系中外幣、外地貸款、外地金融投資等國際資產佔比較高。2016年，金融體系的總資產為14,845.831億澳門元，其中外地資產有10,355.248億澳門元，佔比70%。銀行的總行大多在外地，且銀行的管理人員大都來自香港或外地。3) 澳門是連接中國與葡語國家投資服務的中介人。澳門通過多元化的貿易融資產品，為葡語國家銀行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為中國企業向葡語國家投資、拓展市場提供金融支持服務，滿足中葡企業的融資需求。此外，澳門可利用自身優勢推動海上保險及船舶金融等特色金融業的發展。

四、由小延大：澳門空間發展的基本策略

澳門自身發展的空間有限，要突破增長的極限，需要通過“由小延大”，將狹小的空間對外拓展。

1. 通過“海陸空”並舉，延展澳門的發展空間。1) 澳門是一座“向海出發”的城市。1840年澳門半島的面積僅為2.78平方公里，1863年進行第一次填海工程，到2008年時已增大了3倍超過9.3平方公里，填海使舊的空間形態不斷被打破。2015年國家劃定85平方公里海域交與澳門管轄，為澳門可能的填海提供了回旋餘地，填海仍然是可以討論的空間策略。此外，還可以通過發展濱水休閒以及海上旅遊拓展澳門新的空間。^④2) 澳門可通過舊區重建和城市更新釋放新的空間。2017年8月，颱風“天鴿”重創澳門城市，造成澳門直接經濟損失達114.7億澳門元，同時反映出澳門一些舊區基礎設施老化的問題。澳門特區政府也提出了舊區重整，通過對舊城區土地資源的重整和規劃，以及舊區與新區的聯動功能置換，可以有效拓展城市發展的空間。3) 澳門拓展航運空間還有潛力。澳門國際機場於2005年建成通航，2016年旅客吞吐量为660萬人次，創歷史新紀錄。將澳門發展成連接澳門到與世界的空中橋樑，實際上就拓展了澳門的發展空間。

2. 通過互聯網，把澳門的“無形空間”延伸。互聯網將成為澳門拓展經濟新空間的重要載體。自1994年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澳門積極投身世界互聯網發展變革大潮中。據不完全統計，澳門現有網民近39萬人，^⑤佔居民總數的76%，網絡人口比例和互聯網使用率越來越高。2015年澳門可與25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電話，有利於吸引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遊客。澳門應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加快智慧城市建設，發展互聯網經濟，把“有形空間”向“無形空間”延伸，使澳門成為全球城市的重要“節點”城市。

3. 通過區域合作，把澳門的“轄地模式”向“飛地模式”延伸，發展“飛地經濟”。“飛地經濟”是區域間合作的新型經濟模式，是打破行政區劃，通過協調利益分配機制、實現兩地互利共贏的新發展模式。在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中，把“飛地經濟”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合作模式來鼓勵。“十三五規劃”第三十七章第五節指出：“通過發展‘飛地經濟’、共建園區等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互助機制。”^⑥“飛地經濟”對於空間受到制約的城市經濟體尤其有意義，比如新加坡，通過中新蘇州工業園、中新天津生態城、中新廣州知識城等合作項目，發展了新加坡的“飛地經濟”。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澳門借鑒。緊鄰澳門的珠江西岸土地資源豐富，澳門可以借此打破既有行政區劃的束縛，重新佈局產業鏈，形成“澳門+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門）的飛地模式。此外，正在規劃建設的“蘇澳飛地”，即澳門與江蘇常州合作開發建設的“蘇

澳合作園區”，將打造成為蘇澳全面深化合作的實踐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項目的承接平台、澳門青年在內地創業創新的落地平台、蘇澳青年公務員交流學習和提升專業能力的鍛煉平台，也是澳門尋求“飛地模式”的重要探索。

4. 通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小”澳門向大灣區延伸。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澳門拓展發展空間提供重大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在面積、人口、經濟規模上都已與紐約、東京和舊金山三個灣區可等量齊觀。粵港澳大灣區將躋身全球主要灣區之列，成為粵港澳分工清晰、協作緊密、優勢互補、互通共融、最具全球綜合競爭力的城市群之一。澳門應將“國家所需”和“澳門所長”有機銜接，主動融入大灣區建設，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在基礎設施上的互聯互通，在促進區域市場一體化方面適度開放，鼓勵本澳居民進入粵港澳大灣區拓展發展空間，推動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促進澳門民生改善及社會穩定。

結語：研究澳門從“小”處着手

本文從經濟學“小”方法論出發，分析澳門的城市功能、產業發展和空間格局，有利於豐富“澳門學”研究。本文認為，澳門空間狹小，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研究澳門應從“小”處着手，從美好的“小”事物中窺見“大”事物，從“大”型事物中尋找“小”事物的優點。為此，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澳門應從“小”處着手，看中“質量”，而不是“規模”。從澳門城市發展的角度來說，應擺脫對“大思路、大手筆、大規劃、大開發”的超大城市的嚮往，從小處着手，讓“緊湊、多樣、混合”成為澳門城市物質空間的核心價值。從產業發展來說，澳門依靠大眾生產而不是大量生產，為此，澳門要擁抱互聯網時代，發展“知識密集型”的創新產業，培育新產業、新業態，發展新的動能，使產業多元化落到實處。

第二，澳門要堅持從美好的“小”事物中窺見“大”事物。從澳門優質生活的角度看，澳門始終要把環境放在第一位，應該致力於從產業發展、社會發展等各個視角尋找適合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技術”，探索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模式。澳門要面向海洋、保護海洋、利用海洋，把“小”的陸地和“大”的海洋融入到澳門城市的空間發展格局中。

第三，發揮智庫在澳門研究中的作用，將“澳門學”的研究應用到各項政策主張，把經濟學“小”方法論作為指導澳門實踐的重要理念，綜合體現到各項政策體系之中。一方面，智庫可以從“前端”（澳門自身傳統）產業出發，為實現傳統博彩業、會展業的轉型提供智力支撐；另一方面，可以從“後端”（即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方法與技術）開始，加以改造、調整，使其適應澳門的經濟社會環境。最後，智庫還可以在澳門開展各種實驗和研究，把澳門作為經濟學“小”方法論應用的場景和案例來開展田野調查，使澳門學研究成果可廣泛應用於各種政策主張。

①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6期。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廣州：《學術研究》，2011年第12期。

②王敏：《“小的是美好的”還是“大的是美好的”——從經濟學角度看企業規模問題》，西安：《現代企業》，2004第5期，第6頁。

③周聖強、朱衛平：《產業集聚一定能帶來經濟效率嗎：規模效應與擁擠效應》，南京：《產業經濟研

究》，2013年第3期，第13頁。

④張培剛、張建華：《發展經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12頁。

⑤葉純青：《互聯網之“聚”“散”終有時》，廣州：《金融科技時代》，2015年第6期。

⑥澳門交通事務局：《註冊機動車期末數目》，2017年10月。

⑦劉成昆：《澳門城市可持續競爭力：特徵與趨勢》，見吳志良、郝雨凡主編：《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6—201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46頁。

⑧吳宏岐、吳滿強、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⑨孫九霞：《澳門的族群與族群文化》，廣州：《開放時代》，2000年第7期，第78頁。

⑩馬越、陳偉新：《澳門建築風格的演進和異化》，北京：《世界建築》，2009年第12期，第130頁。

⑪澳門經濟局：《2016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統計指標體系分析報告》，2016年12月29號，第8頁。

⑫澳門經濟局：《澳門經濟季刊》，2017年第3季，第52頁。

⑬⑭郝雨凡、林廣志主編：《澳門綠皮書：澳門旅遊休閒發展報告（2016—201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307頁、第12頁。楊道匡：《澳門城市空間拓展與經濟產業多元發展》，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3期。

⑮澳門郵電局及電訊有限公司：《互聯網服務登記用戶（期末）》，2017年10月。

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三五規劃”），2016年3月。

作者簡介：郭萬達，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研究員。深圳 518029

[責任編輯 劉澤生]